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精品书系

桑青与桃红

[美] 聂华苓 著

华夏出版社

桑青



〔美国〕聂华苓 著

华夏出版社

199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桑青与桃红/(美)聂华苓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 1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精品书系/张炯, 王淑秧主编)
ISBN 7—5080—0876—6

I. 桑… II. 聂… III. 长篇小说—美国—当代 IV. I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8535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53千字 3插页

1996年1月北京第1版 199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7.50元



聂华苓，湖北人，1925 年出生，1948 年在南京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1949 年去台，1960 年任“自由中国”编辑委员和文艺主编，曾于台湾大学中文系和东海大学教文学创作课。1964 年美国爱荷华大学聘聂华苓为“作家工作坊”顾问，1967 年和美国诗人安格尔一同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地有名作家到爱荷华写作、讨论、旅行。1977 年，三百多位各国作家联名推荐聂华苓和安格尔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聂华苓在美已得三个荣誉博士学位。1981 年，与安格尔一起得到美国五十州州长所颁文学、艺术贡献奖，1981 年至 1982 年，聂华苓为美国纽斯塔国际文学奖评审员之一；1988 年至 1989 年，为美国飞马国际文学奖顾问。

聂华苓已出版二十多种著作，包括小说、散文等，《失去的金铃子》、《台湾轶事》、《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为其代表。《桑青与桃红》1988 年英文版获 1990 年“美国书卷奖”。

出版说明

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的作品获得了世界性影响，成为华文文学一个重要的支脉。这一支脉就其精神走向和艺术实践效果来说，不仅很好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由于参与其中的作家所处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得它在题材领域、描写对象上又具有无可替代的独创性，在浩如烟海的华文文学创作中，始终闪耀着自己的耐人寻味的光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支脉以自己的真诚和努力，极大地推动了华文文学创作的发展。

为了沟通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同大陆文学界、读书界的联系，展示大陆以外华文文学作品的独特魅力，我们特编选和出版大型丛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精品书系》，奉献给热心关注华文文学创作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和广大读者。

此套丛书的编选原则，首先是在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获得过广泛影响的名家名作；其

次，即使作家和作品还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作品本身的确具有相当的艺术个性和价值，我们也将其编选入列；其三、我们期望这套丛书最终能够展示出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水平，成为了解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的窗口。

这是一项极富现实和未来意义的工作，我们将一丝不苟地坚持长期做下去。我们殷切期望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大力支持，尽可能同我们取得联系，向我们推荐和介绍自己或他人的创作，我们将竭力地去做好每一个环节的工作，使之开花结果。与此同时，我们还期海内外有眼光的企业家及各界人士给予华文文学事业发展以更多的关注，在经济上、道义上给以更多的支持。

华夏出版社以弘扬华夏文化为己任。我们将视我们的工作开展情况，逐步在更多方面为宣扬世界华文文学创作成果做出我们的贡献。

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编辑室

编选说明

世界华文文学随本世纪华人越来越多地走向五大洲，迄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语种文学之一，而海外华人文学作为世界华文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所当然会日益受到所有炎黄子孙的重视和注意。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的广大读者和文学研究界，也越来越广泛地阅读海外华人用华文写作的作品。自然，在世界的各个地区，华文文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大陆而外，台湾、香港和澳门自是华文文学的一个重要地带。其次，东南亚由于华人众多，华文文学也相应应有可观的发展。至于北美、西欧、澳洲和南美、非洲，则又次之。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以散文、诗歌为多，而小说的数量虽不很大，却颇引人注目。海外小说中，长篇小说的数量尤少。与大陆八十年代以来每年都要出版一二百部长篇自不可相比。

但长篇小说由于篇幅长、内容广，描写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画面丰富，没有相当生活积累和艺术准备的作家，便很难问津。这种体裁被认为是文学中的重武器，甚至被称为“当代的史诗”，受到读者的欢迎是很自然的。

别林斯基在论述长中篇小说时曾说：“长篇和中篇小说现在居于其他一切类别的诗的首位；它们包括了一切艺术文学，以

致任何其他作品和它们比较起来，都显得是稀见而偶然的东西了。”他认为，长中篇小说“结合了一切其他类别的诗：既有作者对所描写事件的感情的吐露——抒情诗，也有使人物更为鲜明而突出地表达自己的手段——戏剧因素。其他类的诗所不能容忍的旁白、议论和教训，在长篇和中篇小说里都有其合法的地位。长篇和中篇小说给作家的才能、性格、趣味、倾向等主导性能以充分发挥的余地。”（《1848年俄国文学一瞥》，《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00—201页）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理所当然应把长篇小说与那些满足公众日常需要的、快餐式的作品区分开来。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为帮助我国大陆的读者了解海外华文学的成就，我们特意编选了这套《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精品书系》。

这套丛书的编选原则是，既照顾到各个地区和各种题材、形式与风格的作品，又尽量选取知名作家的代表作，分期分批推出。当今长篇小说已是门类众多，并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加以分类。比如以古今题材划分，就可以分历史小说与当代小说；以内容划分，更可以分社会问题小说、爱情小说、道德伦理小说、侦探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以读者对象划分，又可以分儿童小说和成人小说；以艺术方法划分，还可以分为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等等。这里首批推出的作品就既有台湾、香港地区的，也有东南亚和西欧、北美的。其中选自台湾和北美的作品多一些。因为北美的华人作家较多，出版的长篇小说也较为丰富。至于海峡彼岸台湾省的中国作家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更多了。这些作品大多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版的，较早的一部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先用日文发表，后来才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的。至于更早的作品只有留待以后再考虑了。在题材内容

和形式风格方面，本丛书也力求多样。如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融现代于现实，将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小说的技巧用来描写主人公从大陆到台湾又到美国的被放逐的生活和分裂的性格、心理；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用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细腻地揭示主人公牟天磊从台湾到美国后的失落感和无根的乡愁；陈若曦的《纸婚》则以几近荒诞的旅美华人本无爱情的假婚情节，表现了人性的善良和人类的悲剧；刘以鬯的《岛与半岛》却借鉴西方“新小说”的笔法反映了香港社会七十年代广阔的生活画面；梁锡华的《李商隐哀传》是以我国古代大诗人李商隐一生的不幸遭遇为素材创作的历史小说；赵淑侠的《我们的歌》将理想与现实相结合，描写了留学生江啸风返回台湾为弘扬民族文化所作的可贵的努力；林耀德的《1947 高砂百合》探索以诗的语言与魔幻笔法相融和，描绘台湾泰雅族的生活和命运；张系国的《五玉蝶》展开奇特的想象，在科学幻想的领域，引导读者漫游于科幻的非现实的神秘天地；流军的《赤道洪流》于现实的描写中，为人们再现了马来西亚华人与当地人民一起开展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至于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所刻画的主人公胡太明，则是一个克服了孤儿意识和殖民地性格的典型形象，相当生动地反映了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生活和人民的觉醒与抗争。

从上述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本世纪华人在大陆、台湾和香港以及海外许多国家的广阔生活场景和形形色色的典型形象，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性格和行为中有着多么深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尽管身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生活情境，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优秀文化传统的自豪，对于民族反抗侵略和压迫的自强不息的不懈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不平与苦难的同情和关怀，始终有如一条思想主线，贯串于所有作品的多姿多彩

的艺术图画之中。从这些作品也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世界文坛所涌现的各种文艺思潮和艺术表现手法，在一代又一代华人作家那里，也无不被广泛吸取和借鉴，而且都融进了自己的独特创造。

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得到了有关作家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帮助。华夏出版社基于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华文文学繁荣发展的崇高宗旨，承担了丛书的出版重任。我们应当向有关作家和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也热切地希望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继续得到出版社和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的更多支持和帮助，以期把编选工作做得更好，更能反映世界华文文学的实际成就。

张炯 王淑秧

1995年5月10日于北京

漂泊者悸动的灵魂

——《桑青与桃红》浅析

董之林

“不要忘了山巅/水崖/到处是你们的故乡/千万家”
到处你们是落花。”

穆木天：《落花》

也许诗人有这种灵性，当本世纪的帷幕刚刚揭开，他便预见到一群漂泊者的命运将降临这布满战乱、饥馑与无穷灾难的土地。对固守本土生活的我们来说，似乎有幸没成为这预见的承受者；但聂华苓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却使我们恍然看到漂泊流徙中的另一半自我。这不仅由于作品的人物与我们同宗同族、历史相袭，而且就连他们在异国他乡的遭遇，几近疯狂的苦闷，也像“寓言”一样，将本世纪末，处在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人们缺乏归宿感的惶惑揭示了出来。

正如作家所言：“《桑青与桃红》只是一支浪子的悲歌。”小说女主人公桑青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是一个全无政治背景、刚十六岁的青年学生。她在完全不期然的情况下，经历了横跨大陆、台湾和美国三个不同世界的人生。桑青的青春时代正值抗日

烽火席卷中华大地，但“抗日救亡”这个曾经鼓舞千百万热血青年投身沙场的口号，并不是桑青告别故土的真正原因。她与十八岁的女伴老史离家出走，到重庆开始她们“理想”的生活，几乎完全出于个人的原因：母亲对弟弟的偏爱，以及旧式家庭令人窒息的氛围。用老史的话来说：“重庆！嘿！好大的城！抗战的中心呀！怕什么？流亡学生招待所管吃管住，升学，找工作，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些话听起来倒很像出自大陆“文革”时期大串联的红卫兵之口，他们身无分文却几乎游遍全国。他们憧憬的革命与寻求冒险、刺激的青春特质是紧密溶合在一起的。桑青与老史也做着这样的青春之梦，老史的话维妙维肖地道出这种青春期的心境：“抗战中心”与让人大开眼界的“好大的城”处于并列位置；“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流亡学生招待所”，为她们长期受压抑与束缚的个性找到尽情渲泄的去处。她们不是时代的弄潮儿，而只想伴随时代的浪潮“过把瘾”，实现一个青春的梦。尽管那梦朦朦胧胧、若隐若现，完全缺乏明确的指涉，但它充满诱惑力的光环足以使涉世未深的青年们砰然心动。然而，那毕竟是一个青春的梦，宛如一捧水中的明月，终究要顺着指间淌尽。何况桑青正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五四女儿”离家出走的行径不仅没成全她的愿望，而且使她从此像断线的风筝，随风荡落在生活囿囿的角落，在这片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土地。生活好像特别愿同喜爱幻想的人开玩笑。正当她们投奔“抗战中心”的路上，“抗战中心”已不存在，因为日本人赶在她们到重庆之前已经投降了。桑青辗转迁徙至北平，这时生命的辉煌已成奢望，于是她像许多女人一样，嫁了一户还算说得过去的人家。她本来也许就是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金锁记》），坐定大户人家“正头奶奶”的位置。但伴随解放军“围城”的炮声，她与丈夫沈家纲送走家里最后一件狐皮大衣，一路艰辛来到台湾。丈夫死后桑青又到美国，“在逃

避移民局的缉捕，在美国的公路上，一次又一次兜搭顺风车，任由路人带她到别处去……”（白先勇：《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

在时代变革的激流中，桑青实在是再平凡不过的女人。她既不是时代革命与战争的积极参与者，同样她的人生悲剧也不是由于参与革命或战争造成的。反之，那些事件只作为她个人命运的背景，构成她生活线索上的一个个连接点。作品感人至深之处在于桑青个人的命运，在于她那始终涌动着、压抑着欲望潜流的悲剧性格，以及这种性格与现实环境的张力。作家在为这部小说写的序言中说道：“我所追求的目标是真实。《桑青与桃红》中的真实是外在世界的‘真实’溶合在一起的真实。小说里的事件很重要，但它的重要性只限于它对于人物的影响以及人物对它的反应。小说中最重要的还是‘人’。”因此，尽管这部长篇小说的后半部分采取意识流等现代派小说的表现技巧，但它依然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有必要说明的是，这种现实主义是建立在强调个人经验在小说中应占首要地位的基础上，正如作家所言，“事件”是依人物具体的、独特的经历而“设定”的。如果说，发生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事件”已经有所定论，小说家的任务并不是纺织一些故事，以证实那些一般性结论的是与非；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公认的适合于创造性想象的文学出路，在于用本身并不新奇的情节（在这里，可以说是‘事件’）诱发出个人的模式和当代的意蕴，这个任务则尤其不易完成。”（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6月版）作家以她的人物，具体地说，也就是桑青以及作为桑青性格另一侧面显现的“桃红”，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不易完成的任务”。

桑青的性格在现实生活中是颇具悲剧意味的。她对现实的政治事件，特别是对大半个世界以来，许多中国人认为左右国家

命运、前途的那些战争或历史纠葛十分隔膜。在政治无时无刻不左右着人们命运的环境，桑青却始终对此茫然无解。在她看来，政治就像她在阁楼主人蔡先生家帮工时听到的“匪谍案”以及形形色色的案件那样，扑朔迷离、令人不知端详。所以在“姜子牙”、蔡先生的思想中，谁和谁打仗已经不是要紧的事情，要紧的是这些战争与政治事件对个人命运的阻隔。或许，这也就是在不懂得政治的桑青心目中政治的倒影。尽管桑青只专注于眼前的现实处境，但是，政治、历史并没因为桑青不介入与不干预的平常人心态而赦免这个无辜者，她正是在不设防的状态下，被它们强大的冲击波排斥到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地步。因此，那段历史在她看来，就是她无从解释、无可告白，却在冥冥中把握她的命运之神。

然而，对历史的无从把握，对政治的无所作为，并不意味着人们对生活便无所适从。桑青对关系自身生存与命运的事件具有一种出自本能的选择。或者说，她是以出于生命自然状态的直觉来对待和处理眼前的一切的。因此，当她们赴重庆途中在瞿塘峡遇险，她首先考虑的是回家，而不像老史那样一往无前。当她因丈夫在台湾为生活所迫贪污公款而被通缉，全家不得不躲在蔡家阁楼像动物似的爬来爬去时，她终于耐不住这种不是监狱的监狱生活，领着女儿桑娃走出阁楼。在美国，她怀了江一波的孩子，直觉告诉她那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人；她爱小邓，也是因为直觉在瞬间的启悟：“不论他到哪儿去了，他会承当那儿的一切，甚至弱点。他在内心找到自由。因为他决定了自己的行动。”

这是一种女性的直觉，其中包含女性对自然生命状态的欲求。对桑青来说，这种欲求是十分强烈的，它产生于她十六岁瞿塘峡遇险的那个孤岛上。在这个与人世隔绝的孤岛上，同行六人面对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面对时时降临的死亡威胁，每个生活

着的人对其他人都是一个生的鼓舞。而平常岁月约束人的社会、道德行为准则，在生与死的现实面前则十分淡漠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桑青对同性史丹（即老史）和异性“流亡学生”都发生了身体的恋情。这种描写在本文中是大胆的，也是顺其自然的。作家对人生自然状态的欣赏，特别通过描写当时桑青身边的人物桃花女而得到清晰的展现。作家曾经这样说：“我很偏爱乡下女人桃花女，她‘坐在船板上，抱着孩子喂奶。孩子吸着一个奶，手在另一个奶上拍拍打打，配着吸奶的啧啧声，好像给自己打拍子，又像是要把奶拍出来——一滴一滴，滴在孩子胖嘟嘟的臂膀上。桃花女就让奶那样子滴下去。’”因为需要给孩子喂奶，桃花女经常是裸露的，举止稍显轻浮的。但在这个与尘世隔绝的孤岛，她唤起人对生活的渴求，她就是生的欲望与美的化身。桑青踏上社会的第一步就进入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受到一种不受约制的人性氛围的影响，她完全沉浸在追逐自然人性的快感中，这酿造了她的性格基因，同时，也埋下日后她个人生活悲剧的种子。

顺沿女性的个人欲望，桑青像是对人性的大胆勘探者，全无她面对政治历史时的惶惑不安。她像一个顽皮的女孩，悄悄地闯入人生一个个向她紧闭的房门，以求品尝受现实道德尺度所不容的人生禁果。这是桑青性格中桀傲不驯的一面，也是她生活中屡遭挫折的主要原因。她在青春期丧失“贞洁”，正应了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丈夫骂她是“破罐子”；她对丈夫完全失望了，这才使她不顾丈夫“狠狠”的注视，告诉警察她的“配偶”的名字“沈家纲”，那正是他们所要通缉的逃犯。然后，桑青从台湾到美国四处流浪，这也是她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的流浪。就像她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国籍、身份证，没有家庭的归宿，她在感情上无定规地到处流浪。她性格中渴望归宿而又逃避归宿的“探险”，造成

她精神分裂。“桃红”是桑青双重性格的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是她性格冲突的具体显现。桃红是作为桑青欲望的象征、一生的见证人兼叙述者出现在作品中的正如桃红所言：“桑青是桑青。桃红是桃红。完全不同。想法，作风，嗜好，甚至外表都不同……桑青关在家里唉声叹气；我可要到外面去寻欢作乐。”对人性自然欲望的探求与及时行乐的颓废，构成桑青与桃红的分歧点，同时，二者又难以截然分割地搅在一起，正像她们本是一个人性情的两个侧面。但是随着作品时间的延续和情节的进展，这两重性格在人物身上并不是平分秋色，特别是在美国的生活环境中，外乡人的苦闷，已经使早年在瞿塘峡与老艄公、桃花女、“流亡学生”同舟共济的桑青——那个对人生满怀好奇与憧憬的十六岁少女——不复存在，而只有纵欲过度，对人生已不再怀有任何责任感的桃红。也许，在桑青的探求与桃红的纵欲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但本文显然更倾向于早年带有浓厚本土生活气息的桑青，而对终将客死他乡的桃红只有无奈的悲悯了。

对政治历史的无从把握，与对个人欲望的不可抑制，如同两条无情的鞭子，狠狠地抽打着桑青的心灵。而在并不顾及桑青个人欲望的那种政治历史中，桑青在远离尘世的孤岛上形成的个性，以及她满足欲望的形式，在现实中注定是难以实现的。于是，滞留孤岛与逃离尘世就成为一种人生的悖论。正是在此意义上，小说充分显示出“寓言”的性质。“孤岛”既然不是久留之地，那么现实中哪儿还有充分满足个人欲望的“净土”？孤岛固然慷慨地赋予搁浅者们显示潇洒的空间，但是那里的环境也真令人触目惊心：“白墙哗啦一下垮了。那条船就像西瓜摔在石头上一样裂开了，把船上的人全拦到水里去了。又一阵大浪翻起来了。大浪过去了。水里的人不见了。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水荡走了，太阳也荡起来了。大浪过去了。水里的人不见了。一点声音也没有

了。水荡走了，太阳也荡走了。只听见咚……咚……”的水声。生与死的寂寥压得人透不过气。在这里，“孤岛”本身即是一个寓言。作家曾经说：“我在《桑青与桃红》的创作中所追求的是两个世界：现实的世界和寓言世界。读者把它当写实小说读也好，把它当寓言小说读也好——这一点，我不知道是否成功了，但那是我在创作《桑青与桃红》时所作的努力。”就此意义而言，桑青的生活经历了三次真正的“逃离”：一次是她从老家逃出，来到瞿塘峡那个真正的孤岛上；一次是她从北平逃出，逃进台湾的“阁楼”，那也是一个与尘世隔绝，与老鼠为伍的“孤岛”；之后，她从台湾逃往美国，相对本土，那里是一个个人的“孤岛”。她一次又一次与各色各样的人发生性关系，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用人与人的亲和力来排解异乡的孤独。但是这一切努力全都无效。她与这里的人生始终隔一层。这里的环境就像“移民局的人”，怀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大阴天也戴着墨镜”，在那“两片大墨镜”的后面，似乎永远看不清他的真实面孔。相对这些桑青逃亡的“孤岛”，故乡与北平的生活又简直压抑得令人窒息。桑青的婆母是本土一种生活的象征：自私、偏狭、虚伪、反复无常，她被生活扭曲了性格，同时也以十倍的报复力量去扭曲别人的性格。桑青在本土与“孤岛”的生活之间往来穿行，哪里也找不到一处理想的归宿。与其说，这是一次离乡背井的逃亡，不如说这是本世纪中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围城”心理，是人精神上的一场悲剧。

《桑青与桃红》的故事脉络十分清晰，正如作家所言：“我是一个安分的作者。”从小说描写桑青在瞿塘峡、北平、台湾、美国生活这四个部分来看，基本顺延了本世纪四十年代末，由大陆迁徙至海外的一批中国人的足迹，其中也夹杂着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聂华苓一九二五年出生，祖籍湖北，一九四八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一九四九年去台湾。六十年代应台大